

道德内化论

邱吉 ● 著

民族出版社

道德内化论
PDG

道德内化论

邱吉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内化论 / 邱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4
ISBN 7-105-06199-5

I. 道... II. 邱... III. 道德修养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31996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0001-1000册 定价: 20.00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序

许启贤

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有着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比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对公民的整个社会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就提出了很多具体规范，特别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说，对公民的道德要求方方面面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规范内化为每个公民自觉的道德行为。否则，道德规范再多、再好，也是无用。

“内化”这个概念，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来了。《庄子·知北游》说：“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陈鼓应先生解释说：“内化，内心游移。”道德内化，实际上就是道德在人心游移。中国历代儒家很重视道德教化、内化和道德修养。他们说的“修身”、“省身”、“正身”、“诚身”、“养气”、“内察”等方法，无不包括着道德内化的因素，也可以说是道德内化的一种方法。《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里的“思”，就是一种道德内化。世界上三大宗教，各自都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他们的道德如何影响自己的教徒，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道德内化。佛教的参禅打坐、诵经，基督教的祷告、诵经，伊斯兰教的朝觐仪式，都是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使教徒们沉思默想，在明心定性中顿悟，向神性及其道德规范靠近。

所以，简单地说，道德内化就是社会对人们提出的各种道德

规范要求如何转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道德内化实际上包括三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客观的社会道德规范，人们通过教育和学习，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产生认知和认同，进而掌握这些道德规范的知识和要求；二是人们在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善恶观念冲突中，学会道德判断，学会道德选择；三是人们积极参与社会道德实践，做出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可见，道德内化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学习道德、领悟道德、认同道德、积极参与社会道德活动，并使自己的品德不断完善的过程。

但是由于人们个体性别、年龄、智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各自成长的环境和经历的不同，所以，道德内化的程度、效果并不一样。当前，我国公民在道德品性和行为方面，有的表现的很好，有的表现的一般，有的表现不好，说到底还是和他们自身道德内化的程度、好坏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为了进一步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真正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就要结合我国现实社会公民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其道德内化的特点和规律。

首先，要研究道德内化的社会环境及文化机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他的道德素质的提高总是和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家庭、学校的道德教育，对公民的道德内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主旋律的提倡，对公民道德内化的影响就十分大。其次，要根据公民的年龄特点、智力水平、心理素质、成长环境等情况，研究其道德内化的特点及规律。如对中小学生学习公民道德教育，就要结合中小学生的认知及心理特点，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学习道德，在社会生活中践履道德，在践履中体验道德、感悟道德。即在做中学，在学中做。任何脱离他们生活实际，教条式的说教都是不利于他们的道德内化。至于成人，不管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等，他们都是在千

差万别的各种职业中学习、工作、劳动、生活，道德内化的情感体验、认知水平、文化程度和生活、学习、工作环境都不一样，他们道德内化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公民道德教育要认真研究他们的特点差别，从中找出有效的教育模式。再次，特别要认真研究“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内化中的问题，使其进一步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人皆信，人人皆行，这在当前尤为重要。

邱吉博士是我国较早接触和研究道德内化这一问题的学者之一。《道德内化论》是她的博士论文。为了探讨研究这一问题，她几乎翻阅了古今中外能找到的相关材料。论文中，她较详细地探索了道德内化的概念、理论依据及内化过程的基本结构，从历史上探寻了道德内化的历史，从理论上论述了道德内化的内在机制、道德内化的文化传承机制，从实践上探索了道德内化的优化模式等问题。论著题目新颖，内容丰富，基本观点正确，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是研究道德内化的优秀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促进我国社会道德和公民道德建设，对促进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004年2月17日—18日于静园

目 录

导 言	1
一、对道德内化思想的历史反思	1
二、对德育观念的现实反思	3
三、时代的呼唤	7
第一章 道德内化概述	9
一、基本概念	9
1. 道德探微	9
2. 内化概念的提出	11
3. 道德内化的内涵	14
二、道德内化的双重价值	16
1. 人的价值的双重性	16
2. 道德内化的双重价值	18
三、道德内化的理论依据	21
1. 认识论依据	21
2. 心理学依据	23
3. 传播学依据	28
四、道德内化过程的基本结构	29
1. 道德内化过程的结构要素分析	30
2. 道德内化结构模式	32
3. 道德内化过程的结构特征	35

第二章 道德内化思想的历史探寻	39
一、儒家的内化思想	39
1. 卷帙浩繁的伦理思想	40
2. 外“礼”内“省”的内化模式	42
二、道教练养术中的道德内化思想	53
1. “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目标	53
2. 道教的伦理思想	56
3. 身心俱炼的内化模式	62
三、宗教道德内化思想	67
1. 宗教的道德精神内核	67
2. “明心顿悟”的内化模式	69
四、西方道德内化思想的发展	74
1. 古代西方理性主义内化观	74
2. 现代西方感性主义内化理论	75
3. 现代西方情理相连的内化理论	79
第三章 道德内化的内在机制	84
一、先导机制	85
1. 认知	86
2. 情感	88
3. 意志	93
二、动力机制	96
1. 本能	97
2. 需要	98
3. 动机	102
三、核心机制	105
1. 自我意识是道德内化的中心环节	107

2. 自我意识是个体欲望的内在调节阀	110
3. 自我意识缺陷与道德内化障碍	111
四、整合机制	114
1. 态度	114
2. 行为	119
 第四章 道德内化的文化传承机制	123
一、物质文化对个体道德内化的全方位影响	124
1. 生产性文化规定着道德的存在方式	125
2. 消费性文化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观念和价值选择	129
3. 休闲文化对个体道德观念的熏染	131
二、制度文化对个体道德内化的导向作用	134
1. 经济制度规定着道德内化的基本内容	134
2. 社会政治制度调控着道德内化的性质、目标 和环境	136
三、精神文化对个体道德内化的潜在影响	139
1. 主流文化导向着个体道德内化的基本方向	140
2. 大众文化为个体道德内化提供了潜在的影响环境	150
3. 精英文化推动着个体道德不断走向超然境界	155
四、文化困境中的道德走向	156
1. 自然性与神性是人性与兽性内在冲突的两极	157
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将促进主体性的 再次回归	158
3. 多元价值冲突必然推动社会 and 个体整合能力增强	159

第五章 道德内化优化模式研究	163
一、道德内化优化模式的基本原则	163
1. 内化与外化相统一	163
2. 情感体验与理性教育相配合	164
3. “虚”与“实”相结合	164
4.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164
5. 立体网络原则	165
二、道德内化要素的优化	166
1. 道德内化客体的优化	166
2. 道德内化主体的优化	168
3. 道德内化中介的优化	169
三、优化模式	170
1. 实践体悟	171
2. 理性学习	179
3. 困境突破	184
4. 奉献超越	187
后记	189
参考文献	191

导 言

人类道德的产生、发展及其运作方式，决定了道德是一个由外在规范过渡到内在自觉、再到行为再现的过程。这是一个由知到行、知行统一的过程。从理论的表现上讲，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绎过程，但在实践中，却是一个极为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任何个体对道德信息的真正内化不完全是为了某种功利原因而被动地服从，更多的是对道德理想、道德生活的深切感悟与体验；不仅是对当下生活的权衡，而且也是对意义、对必然、对神圣的向往。这在客观上要求对道德的社会功能进行重新审视：道德不应该完全成为政治理性的工具，而应回归到人自身内在心性的改造上；德育的方法也不应该只满足于过去那种政治化、权威化的强化灌输方式，也应走向人的内心和情感。从外在走向内在，从理性走向情感、从普通走向特殊，这是现代道德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对道德内化思想的历史反思

历史上，道德内化问题备受中外思想家的重视，并在一些论著中有所触及，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专门论著对此进行系统的论述。在中国，作为占道德主导地位的儒家道德是建立在人伦感性基础之上的，强调实践体验和情感在道德内化中的作用，注重道德传播中的个体感受性和情感沟通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天人合一”的道德终极目标。为达此目标，儒家设定出一套精美的内化思路，即外“礼”内“省”的模式。这一模式在理论上是理性而精致的，然而在它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有时却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悖离的现象，表现出“表里不一”、“内外相乖”等现象。出现这种悖离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的初始过程中就潜在着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他们虽强调“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内化方法，但更强调道德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既是儒家道德跻身为主流道德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儒家道德实践与道德理论悖离的真正原因。虽然儒学心性派对此做了修正，强调道与心、心与理的统一，但因为儒家无法从根本上科学理解人为何需要道德的问题，由此，儒家的个体道德内化论仍没能形成一个完备的、真正科学的体系，最终也没能出现反映内化思想的专门著作。

在西方历史上，从古希腊时期开始，道德内化问题就引起了诸多思想家们的关注，在一些论著中已有所触及。整个古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以理性主义为主线，思想家们把理性作为道德内化的基础来看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把理性看做德性的源泉，感性则被排除在德性之外，不论是德性本身还是德性的获得过程都与此没有密切的关系。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更是以绝对观念、严格的禁欲以及严酷的处罚手段使人匍匐于神的统治之下。人的欲望、人的灵性彻底潜埋在自己创设的沉重枷锁里，使灵与肉处于尖锐的对峙与冲突之中，道德精神被彻底地扭曲了。为了砸碎这个枷锁，把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救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从人的需要、感性出发来呼唤人性的复归，把感性作为个体进行道德内化的基础和出发点；认为欲望不仅是行为的动力，也是道德情感和道德内化的真正源泉。之后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主张从情感角度研究道德和道德内化问题。但是，道德情感主义由于自身哲学基础的先天不足，加上当时心理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对个体道德的内化研究无法避免地带有直觉主义的特点，使之无法形成系统、深刻的研究理论。在理性向情感的过渡过程中，西方的道德精神出现了“断层”和“休克”现象，当西方科技进步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一切的时候，西方出现了由理性向感性过渡的精神危机。这次危机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工业和技术，人成了机器和技术的奴仆。为了解除危机的困扰，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借助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对道德教育进行了不懈探索，以至在 20 世纪中叶出现了丰富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实践模式，对推动道德内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在新世纪曙光来临之际，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些缺乏理性的情感主义内化思想并没有给人以

心灵的安顿，也没有让人找到真正的自我。情感之口张开时，桌上并没有丰盛的精神大餐。一元性的、形而上的道德精神仍然游离于情感之外，甚至被多元情感所掩埋。这为今天的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必须思考的问题：道德内化的科学理论及其体系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现代社会应该向人们提供什么样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在多元性的社会环境中怎样使之内化为个性化的精神品质？

二、对德育观念的现实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道德教育主要以灌输方式为主，但对道德内化问题重视不够，研究不够。

首先，对灌输论在认识和应用上有偏差，把灌输论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德育模式，致使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所谓德育灌输论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系统地输送某种思想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主流道德观念的一元性。如果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划分的话，前者以“灌输论”为主，后者以“美德论”为主。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把教育对象看成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尽情地挥洒笔墨，而不问对象是否能够接受。“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写照。20世纪中叶，社会价值观念开始出现多元现象，美国和西欧等地排斥和反对这种方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民主、自由、尊重人格的理论，诸如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行为主义理论等，核心是在价值引导中进行“自我选择”，把灌输作为“集权”和“专横”的代名词；而“灌输”教育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广泛应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灌输”教育的认识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并最终确定为那一时期最主要的教育模式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加以应用。其经典理论依据来源于列宁关于如何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列宁为此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他们灌输，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之进行正确的灌输引导，才能使他们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者，并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观点包含着两个基本含义：既要用马

克思主义教育工人阶级，或者说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的头脑，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当的途径方向正确的方式，而非不问实际、不分个性的注入式、填鸭式、满堂灌地进行灌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执政领导下，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作为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体系和道德价值观，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人们的头脑中，同样要通过“外面灌输进去”的方式才可能让人认同和接受。实践证明，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目标指向明确，力量集中，形成的合力强大，它在较大程度上适应了新中国对建设人才的需求，对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人生态度和坚定信念起了积极推动作用。遗憾的是，我们在理解和应用这一理论模式的过程中出现了多方面的偏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向了极端，如：只把道德看做一种客体不断强化它的工具性价值，使之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经济的扬声器、文化的维护者，忽视和忘却它作为主体性的价值存在，进而忽视了对个体道德内化的深层次研究。这种倾向在实践中产生的偏向表现为：一是在内容上把政治教育内容与道德教育内容相混淆，大道理过多，可操作性不强，贴近个体日常生活的素材较少；二是突出宣传社会主义道德的人格典范，往往把他作为一种普遍行为加以要求，与此同时，又忽视了对尚未达到理想境界的绝大多数普遍行为的指导；三是理论知识的灌输多，但针对性不足，甚至忽视和回避现实道德生活中的矛盾，忽视对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培养。四是采取强化灌输方式，与个体内在动机脱离，造成人们对道德灌输从形式到内容上的抵触现象。这种运用上的偏差致使道德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你说我听”、“你打我通”局面，但实际效果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样，灌输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抑制了个体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个体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不是从心理上接受，从思想上认同，仅仅是对外在力量的屈从，无法实现内心和良知的自我约束，因而，社会秩序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依靠公民的自觉意识而得以维持。与灌输论同出一辙的另一种德育理论是客体论。这一理论使灌输论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延伸。所谓客体论就是把受教育者看成单纯的客体，只能直接地、

被动地接受教育者所传授的知识的德育观点。这一理论不论在学校教育还是在社会教育中，易使教师与学生、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都蜕变成主客体的关系，权威与服从关系。虽然德育内容来源于生活，但是，这些知识在向个体传递时，却变成了静止、僵化、教条和机械的东西；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不见了，个体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整个被“物化”了、被“标准化”和“模式化”了，没有“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陈独秀语），从而难以成为具有独立批判思维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个体。这与时代发展要求的开拓、进取精神背道而驰。

其次，与德育相连的整个大教育理念存在严重的误区。教育的目的是促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感官、情感、智力、心理和精神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得到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些呆板、枯燥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正在使学校退化为单纯职业性的训练中心，而不是学生全面认识世界、了解社会的窗口。教育学家布鲁姆（Bloom）对此作过极为深刻的评述，他说在大学里：“所有的系或部门都在宣传本学科的好处，它们所提供的课程都是想让学生成为学科的新门徒。但是学生究竟应该怎样从各门课程中做出选择？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实际上，各门课程自行其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课程实际上是在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而恰恰是这种课程安排上的各自为营，导致了整体性的问题，可是这一问题却从来没有系统地讨论过。大学课程目录的惟一贡献就是让学生无所适从，也常常使学生感到沮丧。他们能否遇到一两个教授为他们提供最优秀的教育，了解某一文明民族最辉煌的部分，全凭他们的运气，大多数教授是专家，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专业，从自己的角度关心自己领域的发展，关心个人的发展，因为他能获得的所有回报都与他的专业成就有关。他们已经脱离了旧的大学体制，这更说明他们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他们只掌握了尚待探索、尚待发现的知识整体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穿梭于狂欢的表演中，而每个表演者在引诱他们来看自己的表演。行为和思想上举棋不定的学生让大多数学生感到尴尬，因为他似乎在说：‘我是一个完整的人，请帮助我完整地发展我自己，让我开发有用的观念和要求深入人心，更不可能被人们所接受和内化，这样的教育

无法从根本上培育出肩负时代使命的、真正我真正的潜能。’而大学对这样的学生无言以对。”^①如果说布鲁姆的这一批判性结论是正确的话，就意味着过去大学的学校教育，本质上只是为职业目的服务的，没有考虑到让学生从多种途径上去理解人生和认识人生的意义。实践证明，我国的学校教育中，这一现象也是一种客观事实。教育更多地让学生掌握了“模仿性”的技能，而没有掌握自由运用知识的能力，更没有在超越专业性、实用性基础上引领学生认知和感受生命的整体价值。正像哲学家波普尔（Josef Pieper）说的那样：“教育关系到完整的人，受过教育的人是一个拥有了理解整个世界的方法的人。教育关系到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才有能力完整地把握一切存在的事物。”^②他的观点让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教育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教育从中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就不可能使任何看似的人来。

由此可见，“内化论”与“灌输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把道德教育看成一个整体，把受教育个体看成一个完整性的人，同时也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看成是道德教育的主体，而且是互动主体，还特别注重受教育者个体在内化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启迪的是良知，追求的是“知行”统一，发展的是整体素质。因此，进行道德内化研究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教育中长期困扰人们的“知行”脱节的问题，它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灌输论”还是“内化论”，都是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在实施具体教育的过程中应掌握好“度”，合理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强调道德内化的重要性就否定“灌输论”的作用，“灌输论”在道德教育中至今仍有它的合理性，两者在促进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①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339-340.

^② Pieper: *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2, P.41.

三、时代的呼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社会生活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的整合力和凝聚力下降，因此需要把传统美德和反映社会发展趋势的主流道德内化于人心，用一种内在的自律精神加强对个体自我行为的规约。在当前情况下，对道德内化问题进行研究，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用“三个代表”的思想确立一种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德育观，使人们在经济发展、生活逐步富裕起来之后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为人自身的存在探寻幸福的真正内涵。这是理论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责任与使命，这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点。

从国际大环境看，科技的迅猛发展对社会传统道德产生了大幅度的覆盖和侵蚀。成几何倍数增长的信息复制和传播速度严重挤压了人们的思维空间，使个体对信息无暇辨别，难以选择。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复制和传播如今不费吹灰之力，正面的、积极的、有效用的信息和负面的、消极的、无效用的、甚至是危害性的信息正以几何平方式的速度增长和传递着。文字、图像以光速穿梭的速度在发展，繁殖之快，令人难以驾驭。特别是既不受物质包装限制，也不受时空阻隔的网络移动方式，不仅使国家机密、知识产权等受到严峻的挑战，也使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虽然人类因为处于共同的发展阶段和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而存在着某些带共性的、一致性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观念，但由于国家、民族和地域的差异又使其各具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正是其民族性的重要表现。如今，这些内容可以伴随着网络中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学术、艺术等内容而为人们了解、认知和接受，同样，不同民族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和吸纳着其他民族的观念，使人们原有的道德认知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如今网络中大量的文化垃圾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政治较量往往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和渗透。尤其是西方以自己强有力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优势为基础，掌握着网络话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通过网络越过了各民族国家原有